

青年重嵌与乡村振兴双向赋能：校地合作订单式人才培养机制研究

——以张家港市与扬州大学联合培养为例

崔梦情

扬州大学商学院，江苏 扬州

收稿日期：2025年3月20日；录用日期：2025年4月20日；发布日期：2025年4月29日

摘要

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亟需高素质农业人才支撑，然而当前涉农人才普遍面临“下不去、留不住、用不好”的结构性矛盾。本文以张家港市与扬州大学联合开展的“订单式”农业人才培养模式为研究对象，通过田野调查、深度访谈及量化分析，系统探讨校地合作如何通过“定向招生-精准培养-协议就业”闭环机制破解人才困境。研究发现，该模式通过制度性嵌入、资源性赋能与关系性重构，实现了青年人才从“脱嵌”到“再嵌”的转型，有效激活了乡村治理与产业振兴的内生动力。研究为新时代乡村振兴人才供给机制创新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

校地合作，订单式培养，乡村振兴，人才嵌入，双向赋能

Bidirectional Empowerment of Youth Reintegr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Research on the Order-Based Talent Cultivation Mechanism of School-Local Cooperation

—Taking the Joint Cultivation of Zhangjiagang City and Yangzhou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Mengqing Cui

Abstract

The comprehens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critically necessitates the support of high-caliber agricultural talents. Nevertheless, at present, agricultural-related talents commonly encounter the structural predicaments characterized by “inability to be deployed to rural areas, difficulty in retention, and ineffective utiliza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order-based” agricultural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 jointly initiated by Zhangjiagang City and Yangzhou University as its research object. Employing field investigations, in-depth interviews, and quantitative analyses, it systematically probes into how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local authorities can surmount the talent bottleneck via the closed-loop mechanism encompassing “targeted enrollment, precise cultivation, and employment in accordance with agreements”.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is model has accomplished the transition of young talents from “disembedding” to “re-embedding” through institutional embedding, resource-based empowerment, and relational reconstruction. As a result, it has effectively invigorated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s for rural governance and industrial rejuvenation. This study furnishes both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a practical pathway for the innovation of the talent supply mechanism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University - Local Government Cooperation, Order-Based Cultiv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Talent Embedding, Bidirectional Empowerment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一)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人才困境与涉农人才培养的结构性矛盾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的核心路径，其成功实施高度依赖人才支撑。然而，当前我国乡村面临“人才空心化”与“供需错配”双重困境，反映出涉农人才培养体系的结构性矛盾。数据显示，涉农专业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率不足 30% (数据来源：《2021 年中国农业农村人才发展报告》，农业农村部，2022)，而县域农业技术岗位空缺率高达 57% (数据来源：《全国县域农业技术人才供需白皮书》，中国农业科学院，2021)。这一矛盾的根源在于高校人才培养与乡村实践需求的深度脱节，具体表现为制度性、资源性和关系性三重断裂。

首先，制度性断裂表现为政策供给与基层需求的不匹配，高校招生就业缺乏闭环机制，导致涉农专业毕业生难以精准对接乡村岗位。其次，资源性断裂突出实践平台建设滞后，学生“在地化”能力培养不足，难以胜任基层农业技术岗位。最后，关系性断裂源于青年群体与乡村社会的情感纽带弱化，乡村岗位吸引力不足，职业发展通道狭窄，使得涉农人才面临“下不去、留不住、用不好”的困境。

以江苏省张家港市为例，尽管其经济发达，位列全国百强县，但 2021 年村级组织人才需求满足率仅

为 42.7%(数据来源:《张家港市乡村振兴人才发展年报》,张家港市农业农村局,2021),凸显了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在乡村振兴中的适配性危机。因此,破解乡村人才困境的关键在于优化人才培养体系,使高校教育更紧密对接乡村需求,并重塑青年与乡村的联结机制,以实现人才的有效嵌入和持续发展。

(二) 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本研究基于嵌入性理论,构建“制度-资源-关系”三维分析模型,系统解构青年人才从“脱嵌”到“再嵌”的动态过程,并以张家港市与扬州大学合作的“订单式”培养模式为例,揭示政策设计、资源整合与社会网络重构的协同作用。

张家港模式通过“定向招生-双模块培养-协议就业”闭环机制,实现人才供给链与乡村需求链的精准耦合,破解基层人才困境。其核心创新体现在三方面:一是通过制度性保障(如学费全免、就业兜底)降低脱嵌风险,确保人才愿意进入乡村;二是依托资源性整合(如双导师制、产学研融合)重塑再嵌路径,提高人才与乡村产业的适配度;三是强化社会网络联结,构建青年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双向赋能机制。该模式不仅深化了乡村振兴中人才嵌入机制的理论认知,也为优化涉农教育体系、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范式。

(三)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径

本研究采用定量与质性相结合的混合方法,以系统分析人才嵌入乡村的作用路径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定量方面,基于对 253 名“张家港班”毕业生和 87 个行政村的问卷调查,通过 SPSS 进行信效度检验与回归分析,量化人才留存率、乡村经济指标变化等核心变量。质性方面,对 32 名关键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官员、校方管理者、毕业生及农户)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深入提炼制度创新、资源整合与文化认同的内在逻辑。

数据来源涵盖政策文本、校地合作协议和田野调查。政策文本部分收集了 2010~2024 年张家港市涉农人才培养相关政策文件;校地合作协议包括扬州大学与张家港市的联合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及实习记录;田野调查累计 12 个月,覆盖 5 个镇级实习基地和 23 个行政村,通过长期跟踪观察获取一手资料。分析框架以“制度-资源-关系”三维模型为核心,结合双向赋能理论,系统阐释人才如何嵌入乡村及其对乡村振兴的驱动效应。

2. 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一) 乡村治理转型与青年返乡的“脱嵌-再嵌”机制

乡村治理体系正经历从传统乡贤主导向新乡贤赋能的转型。传统乡贤依托宗族伦理与礼治秩序发挥治理作用,但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文化权威弱化、治理能力局限及合法性危机等挑战。相较之下,新乡贤通过知识赋能、资源整合及制度创新重构治理角色。其合法性不再依赖道德权威,而更多来自对乡村发展的功能性贡献,标志着乡村治理由“伦理主导”向“能力本位”转型[1]。

在这一背景下,青年返乡的“脱嵌-再嵌”过程成为乡村人力资本重构的关键[2]。提出的嵌入性理论强调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的互构关系,格兰诺维特进一步将其细化为关系性嵌入与结构性嵌入[3]。

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研究多关注产业带动效应,而对文化治理功能关注不足。因此,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不仅需要构建制度化的人才回流机制,还需强化文化认同,以实现青年返乡的可持续性。

(二) 校地合作人才培养的实践探索

1) 定向培养模式的政策演进

我国乡村人才定向培养政策的演进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2000~2010 年,以师范生、医学生为主要对象的定向培养模式,旨在解决基层公共服务领域的人才短缺问题。2017~2020 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定向培养范围逐步扩大至农业、科技等领域,以适应乡村产业升级的需求。2021 年以后,政策进

一步强调“精准匹配”与“闭环管理”，推动人才培养模式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2022 年，教育部、农业农村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新农科建设推进高等农林教育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鼓励校地合作，探索涉农专业订单定向人才培养计划，并实施“入学有编、毕业有岗”改革试点。

在这一政策背景下，张家港市与扬州大学共同探索的校地合作模式，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乡村人才定向培养体系。该模式以“定向招生 - 双模块培养 - 协议就业”三位一体的机制，强化了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实践导向，提高了毕业生的岗位匹配度。特别是在课程设置与实习安排上，该模式借鉴了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通过地方政府与高校的深度合作，确保人才培养的针对性与实效性[4]。

2) 国内外经验比较与启示

国际经验表明，政府、院校和社区的协同合作是实现乡村人才有效嵌入的重要保障。例如，日本“地域振兴协力队”制度通过提供三年期的生活补贴和创业扶持，成功吸引大量青年扎根乡村。美国“乡村领导力计划”则依托高校智库，构建了集技术推广、社区治理、政策倡导于一体的联动体系，增强了返乡青年的社会融入度。

相较之下，我国的校地合作模式仍然存在跨部门协调不足与资源单向流动、地方政府参与度有限等问题。

3) 理论框架构建

本研究构建“制度 - 资源 - 关系”三维分析框架，以系统阐释青年人才从“脱嵌”到“再嵌”的关键机制。其中，制度性嵌入通过定向培养政策、财政激励与就业协议等方式降低人才流失风险，增强回流的稳定性；资源性嵌入依托校地合作、产学研协同等机制提升人才职业适配度，实现人力资本的有效转化；关系性嵌入则通过社会网络重建与文化认同塑造，增强青年人才对乡村的归属感，提高长期扎根的意愿。

在张家港模式中，“双导师制”培养方式(高校教授 + 乡村实践导师)正是资源与关系嵌入的典型体现，既帮助人才提升实践能力，又促进其与乡村社会的深度互动。进一步来看，人才嵌入乡村的过程并非单向赋能，而是青年人才与乡村在互动中实现相互增益的“双向赋能”过程：一方面是乡村获能，青年人才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等方式推动乡村发展；另一方面是个体赋能，他们在基层实践中积累经验、提升职业能力。该机制的有效运行需满足三项条件，即利益相容，确保各方共赢；能力匹配，定制化培养人才；情感共鸣。降低返乡适应成本。

这一框架突破了传统研究对经济激励机制的单一关注，强调制度、资源与关系的协同作用，为乡村人才振兴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

3. 研究设计

(一) 案例选择与背景分析

张家港市作为长三角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标杆，2022 年 GDP 突破 3300 亿元，位列全国百强县前三，但其乡村振兴仍面临“高水平经济与高质量人才供给失衡”的典型矛盾：村级组织人才需求满足率不足 50%，农业技术岗位空缺率达 41.3%。这一矛盾在发达地区具有普遍性，使得张家港成为检验人才嵌入机制的理想样本。

自 2010 年起，张家港市与扬州大学创新构建“订单式”校地联合培养机制[5]，通过“需求侧驱动”模式定向培养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地方政府全额承担学费，依据乡村治理与产业发展需求定制“双模块”课程(理论教学占比 60%、实践实训占比 40%)，并协议保障毕业生基层就业岗位。截至 2023 年，该模式累计培养毕业生 253 名，基层服务留存率达 93.6%，服务期内推动村级集体经济年均增长 12.7%，形成了“人才供给 - 产业升级 - 治理优化”的良性循环，为同类地区破解“引才难”提供了可观测、可复

制的实践范本。

(二) 数据收集与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与档案分析构建三角验证体系。问卷调查覆盖扬州大学“张家港班”2010~2023届毕业生(N = 253)、服务村镇干部(N = 45)及农户代表(N = 102)，共发放问卷400份，有效回收率89.5%(358份)，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测量人才满意度、职业认同度等核心变量，并通过SPSS 26.0通过信效度检验。

4. 张家港与扬州大学联合培养模式的作用机制

(一) 制度性嵌入：政策闭环与长效保障

张家港模式依托“需求牵引-政策供给-效果反馈”的闭环制度体系，优化涉农人才的培养、就业与发展路径。首先，地方政府与高校签订定向培养协议，实施“两免一补”政策，即免学费、住宿费，补助生活费，要求毕业生基层服务至少三年，同时提供考研、考编等“柔性退出”选项[6]。这一机制通过经济激励与职业发展保障的平衡，提高协议就业吸引力。

其次，张家港市设立乡村振兴人才专项基金，构建“培养-就业-晋升”链条。基层工作者可优先参评“乡村英才计划”，获得创业补贴及职称晋升渠道，增强人才长期扎根意愿。此外，协议就业群体的长期稳定性推动村级治理能力提升，促进村级“三资”管理规范化，提高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

(二) 资源性赋能：教育与产业的协同创新

乡村人才培养需打通“教育链-产业链-创新链”，张家港模式通过课程体系改革、技术转化机制和校企合作，增强人才培养的实践导向性[7]。首先，采用“双模块课程体系”，其中60%为理论课程，40%为实践课程，并建立课程更新响应机制，根据乡村产业需求动态调整课程内容。例如，新增“数字农业与电商”课程，提升学生在乡村经济转型中的适应能力。

其次，依托“乡村振兴技术转化中心”，形成“需求征集-联合研发-应用推广”闭环，推动智能农业、乡村文旅等领域的技术创新，并通过“技术特派员”制度将研究成果直接落地乡村。此外，产业反哺教育的模式也在张家港得以实践，企业提供实际案例进入高校课程体系，同时选派技术骨干担任实践导师，确保人才培养与乡村产业发展紧密衔接。

(三) 关系性重构：社会网络与文化认同

乡村人才的长期稳定性不仅依赖政策激励，也取决于其社会网络的建立与文化认同的强化。首先，张家港模式强调社会资本的积累，通过“1+1+1”实习机制，即驻村调研、企业顶岗与基层轮岗，推动学生与乡村社区建立长期关系，增强返乡人才的社会认同感[8]。

其次，在文化认同塑造方面，实施“新乡贤文化计划”，推动青年人才参与非遗传承、乡村文创等活动，增强人才与乡村的情感联结，促进青年从“技术输入者”向“社区共建者”角色转变。此外，协议就业群体主导“线上村民议事+线下乡贤调解”机制，提高乡村公共事务协商治理能力，推动乡村治理模式由行政主导向多元共治转型。

(四) 双向赋能：人才成长与乡村发展的协同效应

张家港模式不仅为乡村提供了高素质人才，也为青年人才提供了职业发展空间，实现乡村获能与个体赋能的互动反馈[9]。青年人才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等方式，推动乡村经济发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强村级组织治理能力。同时，青年人才在基层实践中积累管理与创业经验，提升职业竞争力，部分人才自主创业或进入更高层次的乡村治理体系。

最后，为确保人才供需匹配的长期稳定性，张家港模式建立了乡村人才发展评估系统，跟踪毕业生职业发展情况，并结合政策反馈，优化培养模式。综上，该模式通过制度保障、资源整合与社会网络构

建,形成了乡村人才培养、发展与治理的系统化机制。其成功经验可为其他地区提供可借鉴的范式,但推广仍需结合区域实际情况进行适应性调整。

5. 结果与讨论

(一) 人才培养成效评估

衡量人才培养的成效,需从毕业生基层留存率、职业发展路径及其对乡村经济和治理的影响三个维度进行分析[10]。张家港市的“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实施以来,毕业生留乡率超过 90%,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显著缓解了基层农业技术人才短缺问题。

在职业发展方面,该模式的毕业生主要进入村级组织、农业企业或乡镇管理岗位,承担农业推广、合作社运营及基层治理工作。一部分优秀人才在服务期满后继续深耕乡村,成长为村干部、农技推广专家或涉农企业负责人,展现出较强的职业稳定性和发展潜力。这表明该模式不仅有效促进了青年人才扎根乡村,还在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乡村经济与治理层面,青年人才的引入提升了农业技术应用水平,优化了农业产业链,推动了新型农业经营模式的形成[11]。调查数据显示,受访村庄的农作物产量、农民收入和农村合作社运营效率均有所提升。同时,毕业生积极参与乡村治理,提高了村级事务管理的规范化水平,增强了村民的公共事务参与度,为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

尽管张家港模式在人才培养与乡村需求匹配方面成效显著,但仍存在一定局限性。部分地区对定向培养政策的认知不足,导致政策落地效果受限。基层岗位的吸引力不足,可能影响青年人才的长期留存。此外,人才职业发展路径仍有待拓展,部分毕业生在乡村的职业成长空间较为有限。因此,未来需进一步完善政策支持,优化职业发展路径,增强乡村岗位的吸引力,以提高人才培养模式的可持续性。

(二) 模式创新与局限性

张家港模式的核心在于构建“需求侧精准匹配”的闭环机制,实现高校培养与乡村需求的有效对接。模式采用“定向招生-双模块培养-协议就业”路径,形成从人才选拔、培养到就业安置的完整链条。地方政府通过财政补贴、政策扶持和岗位保障,确保人才“招得来、留得住、用得好”。此外,“双导师制”(高校导师+乡村实践导师)培养体系弥补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使毕业生能够快速适应乡村产业需求。

尽管该模式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政策灵活性不足、市场化机制较弱和推广适应性受限等问题。目前,该模式主要依赖政府推动,而市场机制的参与度较低,导致部分地区人才供需匹配仍不精准。此外,如何提供更具吸引力的职业发展路径,以确保人才“留而能稳”,仍是一个长期挑战。区域差异性也是制约模式推广的重要因素,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经济水平和政策环境存在较大差异,如何因地制宜调整人才培养方案仍需进一步探索。

6. 推广路径与政策建议

张家港模式在乡村人才培养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如何优化并在更广泛地区推广,仍需系统探索。基于当前实践经验和存在的挑战,本部分从制度优化、区域推广、市场机制、校地协同和评估反馈五个方面提出针对性建议。

(一) 体制机制优化:精准匹配人才供需

为提高乡村人才培养的有效性,建议构建“需求-培养-就业”动态调整闭环[12]。由省级农业农村部门牵头建立“乡村人才需求数据库”,每半年联合高校、企业更新岗位缺口数据,并据此动态调整高校招生规模与课程模块。例如,某县若数字农业岗位缺口达 20%,可针对性增设“智慧农业技术”实践

课程,同步推行“乡村技术专家”分级认证制度(初级、中级、高级),考核权重向技术实操与创新成果倾斜,获认证者可享受月度补贴及职称评审绿色通道。同时,在省级公务员招录中单设“乡村振兴专项岗”,要求报考者具备涉农专业背景或2年以上基层服务经历,录用后需驻村服务满5年,期满后可优先选调至县级部门或获安家补贴。

(二) 区域分类推广:因地制宜调整培养模式

张家港模式在不同区域推广时,应结合地方产业结构、经济基础和政策环境需实施梯度化推广策略[13]。东部沿海地区可深化“政府-高校-企业”三方协同,例如推动涉农企业与高校签订“订单式”委培协议,企业承担50%学费并定制课程,学生毕业后直接入职,首年月薪可高于当地平均水平。中西部地区则需强化中央财政兜底,设立“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专项基金”,按县域经济水平分档补贴,并联合社会资本提供免息创业贷款。课程设计上采用“基础+特色”双模块,如西部增设“生态旅游策划”课程,实习机制实行“1学期在校+2学期驻村”的“1+2”模式。

(三) 市场化机制引导:增强乡村岗位竞争力

破解乡村人才供需矛盾需强化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引导作用。其一,推动涉农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构建“企业-高校-乡村”协同机制。例如,可借鉴“订单式培养”模式,由龙头企业与高校签订定向协议,企业依据岗位需求定制课程模块(如智慧农业技术、农产品电商运营),并承担30%~50%的学费;学生毕业后直接进入企业乡村分支或合作社就业,服务期不少于3年。其二,设立“乡村青年创业扶持基金”,由省级财政注资60%、社会资本配套40%,重点支持轻资产、高附加值项目(如乡村文旅IP开发、有机农业品牌孵化)。基金采用“分级补贴+风险共担”模式,初创期提供部分启动资金,成长期引入股权投资,并组成“高校教授、企业家、乡村创客”配套“创业导师团”提供技术指导。其三,完善城乡人才双向流动机制,建立“乡村服务积分制”:青年在乡村服务满3年可凭积分优先申请城市保障性住房、子女跨区入学资格或公务员定向招录加分,以此降低人才扎根乡村的机会成本,增强岗位长期吸引力。

(四) 校地协同创新:构建长效人才供给体系

乡村人才供给的可持续性依赖于校地合作深化[14]。一方面,高校需打破传统学科壁垒,设立“乡村振兴交叉学部”,开设“乡村治理与产业发展”微专业,课程体系采用“4+X”结构(4门核心理论课+X门地方定制实践课)。例如,扬州大学可联合张家港市开设“数字乡村建设实务”“乡村集体经济运营”等课程,并配套“校内实验室+乡村实践站”这样的双基地实训,要求学生至少完成固定期限的驻村顶岗实习。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应推行“人才回流计划”,对曾在乡村服务且进入城市就业的涉农专业毕业生,提供“返乡激励包”:包括一次性安家补贴、低息创业贷款及“技能更新培训券”。此外,可试点“乡村人才驿站”,由县级政府统筹闲置校舍或集体资产,改造为青年人才公寓与创客空间,配套基础生活设施与网络技术支持,降低人才返乡的初期适应成本。

(五) 评估反馈机制:优化人才培养模式

乡村人才培养模式的推广需建立科学评估体系,以确保政策实施效果并不断优化[15]。为确保政策实施的适应性与可持续性,需构建“监测-评估-迭代”三位一体的动态优化体系。首先,由省级教育部门牵头建立“乡村人才发展追踪平台”,核心指标包括基层服务留存率、职业晋升率、乡村经济贡献度(如合作社营收增长率、技术推广覆盖率)等,每年度生成区域人才发展指数报告。其次,成立“校地企三方评估委员会”,吸纳高校专家、基层干部、企业代表及村民代表,通过“定量评分+质性评议”方式,对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中期与终期评估,重点考察政策目标达成度与资源投入效益比。最后,建立“需求响应式调整机制”,依据评估结果动态优化培养方案。

7. 展望

张家港模式为乡村振兴人才供给提供了有效路径，但其普适性与可持续性仍需在多维度深化研究：

第一，区域适配机制优化。当前模式基于长三角发达县域的经济基础与治理能力，需针对中西部地区财政约束、产业基础薄弱等现实条件，探索梯度化政策设计。例如将“全额学费资助”调整为“财政 - 社会资本共担”，或构建“基础技能培训 + 特色产业定向”的分层培养体系。

第二，数字技术深度融合。随着智慧农业与数字乡村建设加速，需重点研究技术变革对人才能力结构的影响。未来应关注人工智能驱动的技能需求转型(如无人机植保替代传统农机)、区块链在基层治理中的应用(村级“三资”链上化管理)以及数字技术对乡村文化认同的重塑效应。

第三，制度成本收益分析。需建立长期追踪数据库，量化政策投入与乡村发展的动态关系。例如测算服务年限延长对财政负担与人才贡献度的边际效应，为政策弹性调整提供依据。

第四，国际经验的本土转化。可借鉴日本“地域振兴协力队”的社区共建机制、欧盟 LE 扬州 DER 计划的地方行动组模式，结合我国乡村社会资本特性，构建“制度移植 - 文化调适 - 效能评估”的分析框架，重点关注文化差异对技术转化效率的调节作用。

后续研究需通过构建全国涉农人才动态数据库、开展十年期追踪调查，系统解析人才嵌入机制的长期效应，为完善乡村振兴政策体系提供科学依据。

参考文献

- [1] 中国的城镇化，要走城乡两元文明共生的道路——张孝德教授访谈录[J]. 金融博览, 2013(4): 11-14.
- [2] 王屹, 原钰清, 卢俊林. 嵌入性理论视角下乡村职业教育培训的“脱嵌”与“再嵌”[J]. 职业技术教育, 2023, 44(22): 73-79.
- [3] 王珑玲. 乡村振兴战略与青年参与的行动机制[J]. 中国青年研究, 2019(9): 4.
- [4] 唐慧, 谢莉花. 德国二元制高校教育再审视: 现实矛盾、发展治理与借鉴反思[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3(15): 68-78.
- [5] 黄银忠. 张家港市农业农村后备人才定向培养的启示[J]. 江苏农村经济, 2015(9): 37-38.
- [6] 高琳珍. 农村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J]. 南方农机, 2024, 55(14): 113-116.
- [7] 尚文勤. 乡村振兴战略下大学生“三农”情怀培养研究[J]. 绥化学院学报, 2025, 45(3): 48-50.
- [8] 生永明, 戴世勇. A 大学为张家港定向培养大学生村官[N]. 中国教育报, 2010-12-31(002).
- [9] 赵邦宏. 努力为农村青年创造机会, 汇聚乡村振兴的青年力量——评译著《2019 年农村发展报告: 为农村青年创造机会》[J]. 河北农业大学学报, 2023, 46(6): 122.
- [10] 陈家建, 巩阅瑄. 大学生村官政策成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全国基层治理调查的数据分析[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64(4): 175-184.
- [11] 谭建光, 李晓欣, 苏敏. 中国农村青年志愿服务发展趋势——来自 16,758 份网络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J]. 中国青年研究, 2021(4): 70-75+84.
- [12] 项伟. 大学生“村官”的角色定位问题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苏州: 苏州大学, 2010.
- [13] 高翔, 孟令剑. 张家港大学生“村官”服务远教[N]. 江苏科技报, 2007-07-23(A13).
- [14] 陶静奕, 钱雯羽.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问题及破解路径——基于张家港市的调研[J]. 南方农机, 2024, 55(23): 107-111.
- [15] 韩厢君, 宋浩楠, 曹冲, 等. 地方应用型高校大学生返乡创新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研究[J]. 安徽农学通报, 2025, 31(4): 138-144.